



大学
中庸

评释

乔通
评释

中华书局

乔通 评释

大学中庸

评释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学中庸评释/乔通评释. —北京:中华书局,2015.8

ISBN 978-7-101-11116-3

I. 大… II. 乔… III. ①儒家②《大学》-研究③《中庸》-研究 IV. B222.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61049号

书 名 大学中庸评释

评 释 者 乔 通

责任编辑 刘胜利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8月北京第1版

2015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6 $\frac{5}{8}$ 插页2 字数100千字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1116-3

定 价 18.00元

当代儒家论_{代序}

儒家思想诞生于两千多年前的春秋后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中，出现了一大批为国家、民族、民众所认可、所敬仰、所追随的精神领袖：像先秦时期的孔子、孟子；汉代的董仲舒，刘向、刘歆父子；宋代的程颢、程颐兄弟，朱熹，陆九渊；明代的王守仁（阳明）；也包括之后清代“乾嘉学派”的众多学者和民初“新儒家”的代表人物。这些先贤在儒家思想发展的历史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影响深入人心，且绵延至今不绝。

一 儒家思想一直在被改变

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是儒家思想的原生态时期，这一时期的儒家思想质朴而单纯，远没有后世所赋予的那么多神圣和噱头。原生态儒家思想是那一时期哲人们悲天悯人的情绪反应和思想表达，其理论体系尚不完善，逻辑性和思辨性都不是很强。但正因为其原生态，又没有被太多政治和经济利益所裹挟和绑架，孔、孟等先秦儒家的思想焕发出的是勃勃的生机和真实理性的光辉。

至于两汉，首先是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表章六艺”，再加上始皇帝“焚书坑儒”后带来的儒家经典文本差异，直接导致了

儒家所谓“今古文经之争”。儒家思想成为中央政府支持的官方正统思想，而貌似学术争论的今古文经之争背后，有着太多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影子。这也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两汉之际今古文经之间激烈的争论较量，其实质是王莽托古改制的张目。至东汉，兼通今古文经的郑玄采用糅合混杂的方式注释儒家经典，使汉代今古文经之争在形式上结束。而到了清末，时过两千多年，今古文经之争再起，以皮锡瑞、康有为为代表的今文经学，与以章太炎、刘师培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又形成了近代的今古文经学之争。而这一学术争论的背后，则是“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的较量。

经历大混乱、大融合的魏晋时期，至于隋唐，中国社会“儒释道”三家合流成为大势所趋。又经历更为混乱的“五代十国”，至两宋，中国社会的思潮是活跃的，也是混乱的。以“二程”、朱熹为代表的“义理之学”和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性之学”应运而生。明代王守仁（阳明），继承了陆九渊的衣钵并进一步发挥，将儒家思想的“心性之学”推进到了极致，史称“陆王心学”。不难看出，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与孔、孟时期的先秦儒家思想已经有了极大的不同。它们都是时代的产物，其背后同样有着太多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影子。我们抛开儒家“义理”与“心性”的千年之争不谈，但无论是程、朱还是陆、王，都是以当时的时代需求为背景，对传统儒家思想进行了重大修定与改造。

清代朴学（乾嘉学派）是对宋明“理学”与“心学”清谈的“反正”，李刚主《恕谷后集》卷六《万季野小传》曾引明末清初

潘平格语“朱子道，陆子禅”，说明了“乾嘉学派”对清谈的厌恶和对经世致用的渴望与回归。应该说，清代朴学的兴起对古代经典的文词版本考据贡献巨大。但接下来的“西学东渐”甚至“坚船利炮”的赤裸裸武装侵略，惊醒了中国人的千年儒家太平之梦。面对西方工业文明的绝对优势和对亡国灭种的深切忧虑，中国人对儒家思想的深层次甚至颠覆性反思已不可避免。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新文化运动先驱严复则斥之为“牛体焉能马用”。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儒家思想的大清算和大否定。民初兴起的“新儒家”，则是儒家思想的一次自救运动，其代表人物有：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张君勱、冯友兰、钱穆，也包括1949年之后的牟宗三、方东美、唐君毅、徐复观等。

新儒家有很多学术观点，这里囿于篇幅不便展开，但其核心诉求则包括三项：一、力图在现代和当代中国恢复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重建儒家的价值体系；二、认为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现代化、世界化必须根植于儒家思想；三、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并以此为基础试图融合、会通、吸纳、解释西学。

二 “新儒家”的困局

“新儒家”近一百年来努力功效如何？闻达窃认为，不可谓失败，但也谈不到成功。

“体用”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概念，张之洞提出所谓“中学

为体，西学为用”，是对“中学”和“西学”这对本不搭界的冤家进行的一次失败的调和，这种调和是机械性的，甚至可以说是“简单粗暴”的。再纵观之后出现的“新儒家”思潮，其实也是试图在调和“中学”和“西学”的分歧、矛盾与不和谐。闻达以为，这种调和虽然在方式上不再“简单粗暴”，但其核心仍然没有摆脱“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内涵。而“牛体”确实是不能“马用”的。闻达在此斗胆提出，所谓“中学”与“西学”是两种曾经平行于东西方，以哲学为统领，且截然不同的文化体系，它们于19世纪前半叶在中国以一种非正常方式猝然集中交合，必然引发冲突。双方谁也吃不掉谁，而“中学”在尚处于劣势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成了自保求存的权宜之计。这种权宜已经持续了近一个世纪，到了该结束的时候。首先，“中学”也好，“西学”也罢，就其内容中的某些部分各有优劣和侧重是不争的事实；其次，二者存在不同，存在差异，存在分歧也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没有必要过分强调二者的水火不容，也没有必要非要让二者水乳交融；第三，真理绝不是只以一种形式存在，“中学”有“中学”的体用，“西学”有“西学”的体用，二者可以在一个人身上，也可以在一个国家和民族中同时存在且并行不悖，分别解决其擅长的问题。而一百年来，正是在以“中学”解释“西学”，以“西学”解释“中学”的轮回中，频现“牛体马用”或“马体牛用”的困局。

“新儒家”的另一个特点是继承了理学和心学的“义理”、“心性”之争。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一般受众的困惑和黏合性降低。

“新儒家”的第三个特点是继续反复纠缠于“内圣外王”这一古老命题。重“内圣”，轻“外王”；轻“内圣”，重“外王”；“内圣”、“外王”兼重；此为因，彼为果；彼为因，此为果；彼此互为因果等等，再掺杂上西方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的某些理论，让人一头雾水，莫衷一是，严重割裂了“内圣外王”这一古老命题。“内圣外王”在古代就存在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到了近现代，尤其是当代，即使再作怎样的修补或改良，其社会实践更是落不到实处，而实践与理论的严重脱节，也导致了理论实质的虚弱与苍白。

三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当代儒家”

当然，“新儒家”在儒家现代化乃至世界化的进程中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努力，其历史功绩有目共睹，这是必须要肯定的。

21世纪的中国需要儒家吗？答案是肯定的。这种需要绝不是实用主义的简单复制，更不是功利主义的苟且权宜，而是民心所向，众望所归，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这里首先要强调一个问题，儒家思想中存在很多糟粕，从处于原生态时期的孔、孟即有，而后世的追随者们则更多。这些糟粕必须抛弃掉。

那么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儒家？闻达窃以为，这样的儒家应该具备以下特点：

第一、态度中立。不可否认，儒家思想自西汉之后的发展，都带着非常浓郁的利益色彩，这也是其在近现代广受诟病的根本原

因。因此，摆脱这些利益的捆绑和束缚才是儒家思想在新时代的唯一出路。也只有摆脱这些捆绑和束缚，儒家思想才能在扬弃中成为民族和民众共同认可的普遍真理，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

第二、理论简单。孔子说：“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任何过于晦涩艰深的理论都将严重妨碍其广泛的传播，儒家思想亦是如此。而自孔、孟原生态之后的儒家思想，正是朝着复杂化、艰涩化甚至玄虚化发展。众所周知，思辩是西方哲学的普遍原则，这与东方哲学的方法论是截然不同的。因此，试图通过某些手段让儒家思想具有“思辩性”，成为很多学者的大功课。而这些功课的直接后果就是，使得本已非常复杂的儒家“义理”、“心性”之争变得更加晦涩和诡谲。新时代的中国，需要新时代的儒家，这样的儒家理论必须是简单的，必须是单纯的，大可不必纠结于体用之争，纠结于“内圣外王”，纠结于“义理”、“心性”，纠结于古文今文，纠结于繁文冗词，而是返璞归真，回归其原生态时期的本初状态。大家都知道，《诗经》首篇就是著名的《关雎》，这本是描写青年男女相互爱恋的一首诗，但《诗序》、《诗集传》等解释此诗时说：“盖指文王之妃太姒为处子时而言也，君子则指文王也。”这就是后世强加的“矫情”，这种“矫情”在后世儒家中多得不胜枚举，严重扭曲了儒家思想的真实内涵，理应被摒除。

第三、修持易行。任何一种思想、一种哲学都是要对现实有所指导的，也就是要有其实际功用。儒家思想作为一门以人修身为基础，并推广至家庭、社会的哲学，其修持的实际功用本就显

著。如果摒除那些为后世附会上的繁复内容，回归其原生态时期的本初状态，则其修持将更加易行。

闻达将这样态度中立、理论简单、修持易行的儒家称之为“当代儒家”。

那么，“当代儒家”理论体系包含哪些内容呢？概括说来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使命。儒家和先秦诸子几乎都讲“天命”，“天命论”也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哲学和政治理念，儒家的“天命”则是指上天具有意志，上天会将自己的意志作为使命赋予人世间的某些人，让这些人代自己有所作为，即孟子所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而上天的意志是以儒家思想所宣扬的“仁、义、礼、智、信”等道德为标准的。在新时代，妄谈“天命”早已不合时宜，但儒家思想所阐述的使命确是亘古长存的。所谓使命，小到饮食男女，大到国家民族；微观到修身齐家，宏观到治国安邦，都有使命在其中。不同的人，处于不同的位置，其使命不同。每一个人，无论是对自己、对家庭、对其服务的机构、对社会、对国家、对民族，对应其所处位置和能力不同，都肩负其应该肩负的使命。不同的使命在召唤不同的人，不同的人肩负不同的使命。使命是“当代儒家”理论体系的世界观。

第二、操守。所谓操守，就是儒家思想对每个人提出的道德约束。这些约束遍布儒家《十三经》和历代史籍中先贤们的身教言传，虽然其中有些在新时代已不适用，但其大多数自古及今都

饱含正能量，至今都应该成为我们安身立命、为人处世的底线原则。操守，是“当代儒家”理论体系的方法论，也是实现“使命”的手段和基础。

第三、敬畏。儒家思想不同于宗教，没有“六道轮回”或“末日审判”式的震慑；但是，对操守的坚持和对使命的忠诚也不能仅仅依靠人的自觉和自律。《论语·季氏》：“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这或许是“当代儒家”理论体系亟待突破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当代儒家”及使命、操守和敬畏，是闻达尚很粗浅、极不成熟的一些想法，本文囿于篇幅无法展开，日后当另辟专文或专著详细阐述，以就教于广大读者。

四 “当代儒家”的基础是正确解读经典

任何论点都是以论据和论述为基础，儒家思想理论也是植根于众多传统经典著作之中的。在日常学习中，闻达经常感叹：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真是两种差异极大的语言，对于当代国人，熟练阅读古代汉语，尤其是先秦时期的儒家经典著作确实存在很大障碍。这也正是本书著述的初衷。当然，在决定出这本小集子之前，曾经有过很长时间的踌躇，担心自己学习不精，贻笑方家；但转念一想，能和大家分享多年来学习的心得和成果，也不失为快乐的事。

在本书的注释和现代汉语翻译过程中，闻达参考、借鉴、直接使用了大量先贤们的研究成果，对此，闻达内心充满感恩之情。此外，也有很少部分是依据个人感悟得出的理解，谬误难免，文责自当由闻达个人承担，并请广大读者赐教，以便改正。

书中的评论部分则纯属闻达个人的有感而发，不成系统，却是真情实感。

作为一个儒家思想的忠实追随者，闻达坚信儒家思想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中必将发挥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而儒家思想在新时代的发展，也不可避免地要继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在“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扬弃中不断前行。以本书为发端，如果时间精力允许，闻达发愿，就儒家其他传统经典著作以本书相类似的形式持续与读者分享。

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曾说：“评断一个国家的品格，不仅要看她培养了什么样的人民，还要看她的人们选择对什么样的人致敬，对什么样的人追怀。”而重温经典的过程本是美好和惬意的，也是对自己平时所学的再次考量。

让我们重拾经典，寻回曾经缺失的精神，回归“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的从容和优雅，感悟孔子说的“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的境界，慨叹孟子说的“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英雄气概……

乔 通

二零一五年五月于北京

评注说明

一、《大学》原文底本采用《四书章句集注》本。

二、《中庸》原文底本采用阮元《十三经注疏》中《礼记正义》本（郑玄注，孔颖达疏）。

三、字义、词义的注释大量采用了古今学人的研究成果，为行文的顺畅简洁未一一注明出处。个别注释采用了著者自己的研习心得，文责由著者自负并就教于方家。

四、现代汉语翻译在遵循不违背经典原意的原则下，为行文的顺畅，有部分为意译。

五、评论部分是著者学习经典的心得，谬误、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不吝赐教。

目 录

大 学

| | |
|-----------|----|
| 第一章..... | 3 |
| 第二章..... | 26 |
| 第三章..... | 28 |
| 第四章..... | 31 |
| 第五章..... | 38 |
| 第六章..... | 39 |
| 第七章..... | 41 |
| 第八章..... | 45 |
| 第九章..... | 47 |
| 第十章..... | 50 |
| 第十一章..... | 57 |

中 庸

| | |
|----------|-----|
| 第一章..... | 83 |
| 第二章..... | 96 |
| 第三章..... | 98 |
| 第四章..... | 99 |
| 第五章..... | 101 |
| 第六章..... | 101 |
| 第七章..... | 103 |
| 第八章..... | 103 |

| | |
|------------|-----|
| 第九章..... | 105 |
| 第十章..... | 107 |
| 第十一章..... | 110 |
| 第十二章..... | 114 |
| 第十三章..... | 116 |
| 第十四章..... | 123 |
| 第十五章..... | 126 |
| 第十六章..... | 130 |
| 第十七章..... | 133 |
| 第十八章..... | 137 |
| 第十九章..... | 140 |
| 第二十章..... | 144 |
| 第二十一章..... | 163 |
| 第二十二章..... | 165 |
| 第二十三章..... | 166 |
| 第二十四章..... | 167 |
| 第二十五章..... | 170 |
| 第二十六章..... | 172 |
| 第二十七章..... | 177 |
| 第二十八章..... | 179 |
| 第二十九章..... | 182 |
| 第三十章..... | 185 |
| 第三十一章..... | 187 |
| 第三十二章..... | 189 |
| 第三十三章..... | 190 |

大 学



《大学》本是《礼记》中的一篇，南宋大儒朱熹将其与《礼记》中另一篇《中庸》单独提出，与《论语》、《孟子》并称“四书”。据记载，西汉前期戴德、戴圣叔侄分别整理编订《礼记》，前者称《大戴礼记》，后者称《小戴礼记》。《大戴礼记》现存 39 篇，《小戴礼记》现存 49 篇。由于东汉大儒郑玄为《小戴礼记》作注，唐代孔颖达继而作疏，故《小戴礼记》大行海内，而《大戴礼记》慢慢湮没不显。今天通行的《礼记》，即《小戴礼记》。

在历史上,《大学》最通行的文字版本有二:一个就是上边说到的郑玄作注、孔颖达作疏的版本,亦称“注疏本”或“古本”;另一个是宋儒朱熹的“改写本”。所谓“改写本”,是指朱熹认为注疏本存在多处文字次序颠倒错乱,故重订《大学》作《大学章句》,朱熹改写本对注疏本作了很大的改动——改篇首“亲民”为“新民”,将从“康诰曰克明德”到“与国人交止于信”之间的全部内容移至“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一段之后,将注疏本中原属“诚意”章的“诗云瞻彼淇澳”到“没世不忘”之间的全部内容和“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到“此谓知本”之间的全部内容,夹置于“与国人交止于信”之后及“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之前。这一改动就造成了两个完全一样的“此谓知本”上下叠文相连。朱熹又据程颐之言,认为其中一个“此谓知本”是衍文而删之。删除该句后,又使得“此谓知之至也”一句突兀兀、孤零零地悬置于此,没了上下文的联系,朱熹则认为该文之上又有缺文,于是补写了“格物致知”一段。朱熹对《大学》注疏本的改动包括——变更文字次序3处,改动1字,删除3字,作“格物致知”补传增加134字。

关于上述两个版本孰是孰非、孰优孰劣的争论自古有之,至今未息。郑、孔的注疏本因文字错乱导致的文义不通、佶屈聱牙是不争的事实;朱熹的改写本是否真实还原了儒家原始经典的真实思想也在两可之间。本书不拟介入这一学术争论,而选择流传更广的朱熹改写本(即通行的《大学章句》本)为底本,只为方便读者阅读,并无厚此薄彼之意。